

# 古代哲学的研究

[德]迈克尔·弗雷德/文 葛天勤/译\*

**内容提要:**弗雷德在这篇文章中考察了研究古代哲学的多种方式。弗雷德强调找到“好的理由”对于研究一位哲学家持有的某个观点的重要性;在我们无法找到“好的理由”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构一种推论来实现这一点;而在我们难以重构这种推论时,我们就需要诉诸某种历史背景来理解某个哲学观点。由此,弗雷德强调和重视古代哲学的历史维度,并认为这对于理解哲学来说十分关键。我们不仅要从哲学的层面来理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而且要能够最终分析出它与它的社会历史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联,从而说明它是怎样产生的,如何以哲学的方式对此做了特殊的表达和辩护。弗雷德认为,做到了这一点的哲学史研究才是一种理想的哲学史研究。

**关键词:**古代哲学;研究方式;好的理由;历史背景

【ix】古代哲学能以多种方式被研究。<sup>①</sup> 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并不只是作为哲学思想而让人感兴趣。它们当中也有许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些思想有助于解释很多历史事实,不仅是哲学史当中的,也是其他许多历史当中的,比如说神学史、政治理论史,甚至是文学史。或者说它们是某些我们所感兴趣的历史发展的反思;同样,这可能是一种哲学史的发展,或是其他某些历史的发展,甚至是一些乍看之下和哲学没什么关系的历史发展,比如说识字率的上升。在对于古代生活的历史记载中,那样的生活很少会有不涉及某个哲学家持有某个观点的方面,并且哲学相当深入地进入了古代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罗马法。同样,也几乎不会有古代生活的某个层面没有被反应在古代哲学中,古代生活的很多层面都对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存在着很多对待古代哲学家思想的进路,而这些进路全都有助于增进对它的理解。我们可以追寻这许多历史中的每一个,在这些历史中,古代哲学都起到了一定作用——或是作为一个整体,或是作为一个部分;我们也可以试着以一种适合于所探究的历史的方

---

\* 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ede,1940-2007),生前曾为牛津大学哲学史讲席教授。葛天勤,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本文译自 Michael Frede,“Introduction: The Study of Ancient Philosophy”,in Michael Frede,*Essays in Ancient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pp.ix-xxvii。

① 我要感谢约翰·库珀(John Cooper)和雷蒙德·戈伊斯(Raymond Geuss)在我撰写这篇导言时给予的慷慨帮助。

式来确定这种作用是什么。为什么对于古代哲学的研究这么吸引人、这么活跃的一个理由是,它容许如此多样的兴趣和进路。很明显,认为只存在一种研究古代哲学的方式的观点是错误的。

同样错误的是,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任何一种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研究这门学科。不同的进路必须要被仔细地区别,并保持着区分度。不同的进路适合于不同的兴趣,并且我们获得的结果都相应于这一兴趣和所选择的进路。故而,一个人可以想象,一个人能够通过【x】一位哲学家所在社会的历史和所处的社会地位来解释那位政治哲学家对于财产分配的观点,如果这是那个人所感兴趣的历史,并且如果他选择了这种进路来研究这位哲学家的思想。但是,认为这个人所找到的这个解释是唯一可能的解释,这一点是错误的。因为这位哲学家可能会有很好的理由来解释他对于财产分配的观点,我们会发现这些理由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我们会觉得有必要来解释为什么不是他所在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会采纳这些理由。再者,我们可能没有理由怀疑,正是出于这些理由,他采纳了这个观点。这样,根据我们接近他的思想的方式,我们通过两种较为不同的方式解释了他的思想。这不意味着这些解释中的某一种是错误的,也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宣称其中一种是不合适的。这只是说明了某人持有一个哲学观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实,并且如果我们想把握这一观点的某些复杂性,我们必须容许较为多样的进路,抵抗住宣称只有其中一种进路是合适的这一诱惑。

大体上,一个人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审视某人已经持有的一个哲学观点。一个人可以把它首要地当作一个某人可能会持有的哲学观点来审视它;一个人可能会想知道:这个观点是不是正确的,某人可能会因为什么样的理由而想要接受这个观点,这个观点的可能后果是什么。而那个人完全不会考虑下面这个事实,亦即这个观点实际上在某个情境下已经被某人所接受——因为这一点无关于他的目的。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考虑一个观点,就是在哲学地考虑它。但是,一个人也可以把这个观点首要地当作一个事实上被接受的观点,并且对“这是一个某人在某个情境下的观点”这个事实感兴趣,试图就其自身来理解它。现在,这人可能对下面这一点不感兴趣,亦即在不了解“谁持有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什么”的情况下去理解“某人持有某个哲学观点”这个事实。我们有兴趣去理解“某人持有某个哲学观点”这个事实,只有当我们认为这个事实具有一些重要意义,并以某种方式发人深省的时候。“某人持有某个哲学观点”这个事实具有一些重要意义,并以某种方式发人深省,如果这个观点本质上是在哲学上令人感兴趣的话;或者说,如果这个观点本质上有很大的历史影响力的话——这或是在哲学史当中,或是在其他一些历史当中。或者,这个观点以其他很多方式而发人深省。例如,因为这个观点表明,构成了其他一些历史的一部分的考量(considerations)或事件(events)如何影响了哲学家的思想;或者说,这个观点表明,某些事件和变革的影响力是那么普遍,以至于它甚至也反映在哲学家的思想中。我会把关于过去的事实(它们具有这样的重要性,并发人深省)称作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当然,有人可能会把

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称作历史事实。但是,强调下面这一点似乎很重要,亦即历史学家关注的历史不是整个过去(the whole of the past),而是对整个过去的一些抽象(abstractions),只有某些关于过去的事实进入其中,也就是那些我们觉得有趣的或重要的事实,或是那些我们为了解释我们认为有趣的或重要的事实而必须提及的事实。【xi】为了正确地对待这一点,似乎把历史事实的概念限定为“那些进入一种历史的关于过去的事实”会更加可取。理解“某个人持有某个哲学观点”这个历史事实,就是要能够以一种解释历史事实的方式来解释它。

现在,如果历史事实是“某个行动者(agent)做出某个行动(action)”这个事实,那么我们就要以一种我们通常试着解释一个人为什么做某件事的方式来解释它。我们首先问自己,行动者是否有好的理由(good reason)来做他所做的事;如果我们觉得他有好的理由,那么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理解了他的行动。我在这里和其他各处所说的“好的理由”,意思是我们自己会将其当作好的理由的事物。当然,下面这一点也是对的,那个行动者可能对“什么构成一个好的理由”有不同看法,并且根据他所以为的好的理由来行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为不能被我们毫无困难地马上理解。这恰恰是因为我们不得不首先意识到,他根据一种不同的“什么构成了好的理由”的观念来行动。然后,我们又必须要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一不同的观念。最终,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根据我们自己的关于“什么构成了好的理由”的观念来理解别人的所作所为或思想。尽管在试图理解别人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意识到,是我们的关于“什么构成了好的理由”的观念需要被改变,并且妨碍了我们去理解好的理由。但是,我们可能也会得出以下结论,那个人即使根据他自己的观念,也没有一个好的理由来做他所做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试着寻找一种更加复杂的解释,这一解释将会解释为什么这个行动者做了他所做的事,尽管他没有好的理由去做它。现在,对于一个行动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对于持有哲学观点而言也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认为一位哲学家拥有一个好的理由采纳某个观点,我们就认为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他持有这个观点。我们可能要花一些时间来发现他有一个好的理由。我们不能容易地理解一位哲学家的思想的理由可能在于,我们一开始没能看出,他实际上的确拥有一个好的理由来持有他的观点。在我们能够意识到他有一个好的理由来主张他的观点之前,我们可能要花一些时间来改变我们自己的观点,甚至可能要改变我们的关于“什么构成了好的理由”的观念。我们这样用心研究伟大哲学家的思想的一个理由或许恰恰是这个,亦即我们确信,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有好的理由来说他们所说的,虽然由于我们理解能力的局限,我们不能毫无困难地理解它。我们希望通过研究历史上的伟大哲学家,能够突破这些局限。当然,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这个哲学家终究没有好的理由来坚持所讨论的这个观点。

可能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个结论常常并不容易得到。因为要声称某人没有一个好的理由来主张他所主张的观点,就是在声称这不是由于我们理解上的局限而发觉很难

理解为什么那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这样的声称很难做出,【xii】在哲学家的理智能力和洞见的深刻一般来说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情况下。然而,我们可能还是会有充分信心认为,某位哲学家没有好的理由来主张他所主张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寻找一种更复杂的对于“为什么他持有这个观点,尽管他没有好的理由这样做”的解释。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很明显,对于某个人持有某个观点这个事实的一个充分的历史理解,总是会涉及一种对于该观点本身的哲学的理解(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因为,除非我们对一个观点有了一种哲学的理解(根据这一理解,可以让我们知道拥有一个好的理由来坚持这个观点究竟意味着什么),否则我们如何判断某人是不是有一个好的理由坚持这个观点?即使那位哲学家没有一个好的理由坚持这个观点,对于为什么他持有这个观点的解释也必然要涉及“这不是出于一个好的理由而让他持有这个观点”这一事实。这是一个对于“为什么那位哲学家持有这个观点,尽管他没有好的理由这样做”的解释。例如,仅仅提及他所拥有的差劲的理由(bad reason),不能让人满意地解释他持有这个信念的事实;尽管在事实上,他的确是出于这个理由而持有这个信念。我们仍然没能理解,为什么他出于这个理由而持有这个信念,除非某些东西被加上,使得我们理解为什么他持有这个信念,尽管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差劲的。

但即使是在我们得出结论认为那位哲学家没有好的理由持有他的观点的情形下,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来说明他持有这个观点。在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为什么这位哲学家持有这个观点,亦即给他提供一组假设(assumptions)和一个推论,借此我们可以理解,做出这些假设,并以这种方式论证的人,如何能够认为他所给出的让他接受他的观点的不充分的理由的确构成了一个这样做的好的理由。我们不会和他共享这些假设,或者我们会批评那个论证,抑或二者皆是;但我们可能会理解,即使是我们之中的某个人如何也可能会做出这些假设,或使用这样的一种论证。例如,我们可能会断定,这位作者是一个简单谬误的受害者,这种谬误我们自己也会犯,而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他会认为这事实上是差劲的理由构成了一个坚持那个观点的好的理由。由此,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对于“为什么他持有这个观点,尽管他没有好的理由这样做”的解释。

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得不到这样的一种解释。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地尝试,都不存在我们很容易看到自己也会接受的一组假设或哲学论证,而它可以让我们解释为什么这位哲学家把他的差劲理由当作是好的理由。正是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诉诸某种历史背景(historical context),借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位哲学家持有这个观点。由此,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位哲学家的所有同时代人都做出了某些假设,尽管我们之中没人会做出这样的假设,但是它们很容易解释为什么所讨论的哲学家把他的理由看作是让他采纳这个观点的好的理由。

【xiii】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考虑过的所有解释都是对于一个历史事实的解释,并且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人可能会把所有这些解释称作“历史的解释”(historical explanations)。但是这些解释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而只有最后一种解释试图从历史背景

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事实。那么,可能有必要在这两种类型的解释中做出区分,并把“历史的解释”这个术语保留给下面这种解释:它必须通过诉诸某个历史背景来解释“某人持有某个哲学观点”这一事实。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某人持有某个哲学观点这一事实呢,如果他没有好的理由来这样做,并且如果我们不能找到我们觉得自己也很容易使用的某种推论和某些假设的话?我们要考察这个思想的历史背景,来看看是不是有某种历史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某个人——考虑到他的历史情境(historical situation)——会持有这个观点。

但在这个时候,可能值得指出的是,从“某人持有一个必须要被历史地解释的哲学观点”这一事实,不能推论出“它必须要从哲学史的角度被哲学史家来解释”这一点。或许,如果我们把古代哲学或历史上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past),和对于这种哲学的研究区分开来的话,我们可以避免某些混淆。存在一个对象,亦即古代哲学,这个对象容许某种研究。有人通常会用“古代哲学史”(the history of ancient philosophy)这样的表述来指称整个对象。但是为了避免混淆,我们或许更应该把“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这个术语保留给对于这一对象的某一特定的研究,保留给以下面这种方式来研究这个对象的某一方面,亦即尝试在哲学上公正对待(do philosophical justice)古代哲学的这样一种研究。

我认为有必要做出这一区分的理由如下:哲学史家的任务不是解释某人会持有的随便什么哲学观点,即使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这就是说,这人持有这个观点是一个有一些重要性的事实。哲学史家的任务也不是为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寻找这种或那种解释。相反,哲学史家的任务在于为所讨论的这个观点寻找一种解释,也就是一种适合于哲学史的解释,而不是(比如说)适合于道德史(the history of morals)的解释。因此,某个政治家持有某个哲学观点可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并且这个事实可能只容许一种历史的解释。但是这个事实可能对哲学史而言毫无重要性。这一思想可能不会像一种哲学思想一样引人注目,它可能不会有助于阐明早先哲学家的思想,也不会帮助理解后来哲学家的思想。甚至还可能的情况是,一位哲学家持有一些哲学观点是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但这一点并不能保证这位哲学家在哲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他的观点是如此重要的理由可能仅仅【xiv】在于,他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的朋友,而这位政治家的政治理念深受那位哲学家的哲学观点的影响。

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些哲学思想没能进入哲学史,是因为它们缺乏历史重要性。我们也很容易看到,一些哲学思想没能进入哲学史,是因为它们对于这种历史而言毫无重要性。我们很难肯定地说,一种哲学思想被认为是哲学史的一部分。这一点最终取决于我们持有的哲学史观。但是这样说或许更保险,我们想要让那些对后来的哲学思想产生很大哲学影响力(philosophical influence)的哲学思想成为哲学史的一部分。一种思想可能会以多种方式对后来的思想产生哲学影响:它可能会让所争论的哲学问题显得不同,它可能会提出能够被一个人接受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其他观点,它可能会提供论

证某个既有观点的新方式,它可能会揭示出某个在当下已经被承认的推论的缺陷。如果有很多后来的哲学思想可以被认为以这样的方式依赖于某个早先的哲学思想,那么这个早先的哲学思想无疑构成了哲学史的一部分。并且,反过来说,这些被早先的思想所影响的思想越是有哲学影响力,那么这原初的思想就越是明显地应该被认为是哲学史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说一种哲学思想有哲学影响力,就是说存在一些以某种方式依赖于这一思想,并且必须要通过这一思想来解释的哲学思想。但是一种思想会以几种方式依赖于早先的某种思想。最简单的情况似乎就是,后来的一位哲学家出于一个好的理由而采纳了这个观点。但是,这个观点和理由要足够复杂,从而能让我们假定,这位哲学家出于这个理由而持有这个观点,正是被下面这个事实所推动,甚至说正是由于下面这个事实才变得可能,这就是说,早先的一位哲学家已经出于这个理由而采纳了这个观点。更加复杂的情况是,后来的一位哲学家出于某些理由采纳了一个观点,但是这些理由[事实上]不构成好的理由;而之所以采纳了这个观点,是因为那位哲学家已经说服自己,采纳这个观点的某位早先的哲学家是出于好的理由而采纳它。或者,更一般的情况会是这样,后来的一位哲学家出于某些理由采纳了一个观点,但是这些理由[事实上]不构成好的理由;而之所以采纳了这个观点,是因为这位哲学家被某位早先的哲学家的思想所说服,亦即他把采纳这个观点的理由看作是好的理由。几乎所有哲学思想都以这种方式依赖于早先的思想。这反映出的事实仅仅是,我们总是在(至少是)我们的直接前辈的哲学观点和哲学推论的背景下做哲学;并且,我们不能(至少在一开始不能)不通过我们前辈的观点和推论来看待问题;再者,无论我们如何让自己不受他们的观点和推论的影响,我们总是会对他们有所依赖。并且一般来说,即使是在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那里,【xv】这种依赖性看上去也是很强烈的。如果早期近代哲学(early modern philosophy)看上去,甚至有时候佯称是独立自主的,那也只有当我们对希腊化哲学和晚期中世纪哲学所知甚少的时候才会是这样。所以,狭义上的哲学史似乎就由通过这种方式而具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构成。

哲学史家的任务也不在于为进入哲学史的哲学思想寻找这样或那样的解释。哲学史家反而会假设哲学观点通常由于哲学的理由(philosophical reasons)而设立。他会认识到,有时候哲学观点会被这样一些哲学家提出,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他们没有好的理由来提出这些观点。但是哲学史家仍然会认为,并且常常是正确地认为,考察这些观点很有价值。这样做可能比考察出于卓越的理由而提出的但却无聊乏味的观点更有价值。不过典型的例子则是一位哲学家因为他所认为的好的理由而接受一个观点。哲学史家会试图分辨出这位哲学家接受这个观点的理由,并考察这些理由是否构成了持有这个观点的好的理由。如果没能做到这一点,哲学史家会考察他是否能够重构(reconstruct)某种推论,这种推论能够让我们理解,为什么那位哲学家会认为他的理由构成了好的理由,并因此而接受了这个观点——即使是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可能也会利用这种哲学推

论。只有在这一点也没能做到的情况下,哲学史家才会求助于一种哲学史角度的历史解释。但是他依然会坚持认为,这是因为那位哲学家拥有坚持这个观点的某些理由,并且一定存在某些哲学上的考量(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这些哲学上的考量将会解释为什么那位哲学家把这些理由看作是充分的理由。只不过在当下,这些哲学上的考量已经过时了(dated),而只有处在哲学家的历史情境当中的某个人会采用这样的一些考量。我们会期望,依赖于前辈的思想的某个人会严肃地对待这样的一些考量。我们自己可以想象,假如我们处在那样的情景下,就不会存在什么引人注目的、值得关注的、令人讶异的或是令人震惊的东西了——如果我们审查了这些考量,并下结论认为,我们支持这个观点的理由构成了接受这个观点的好的理由。特别是在这一点上,哲学史家必须要展现出他所有的历史学问(historical learning)和哲学创造力(philosophical ingenuity)。这是因为(1)他必须试着重构某种哲学推论,而这种哲学推论解释了为什么所考察的作者会认为他接受某个信念的理由是充分的;(2)他必须提出一个理由,指出这确实是由于这样一种推论,那位作者认为他的理由是充分的。要做到第一点,通常需要很高要求的哲学上的机敏(philosophical resourcefulness);要做到第二点,则要求切实把握在那个时代可以获得哪种类型的推论和哪些类型的哲学上的考量。

【xvi】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成功地重构出一种推论(我们可以想象自己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接受了这个推论,并且我们有理由认为,那位哲学家会采纳,或至少有可能会采纳这个推论),它依然是一个有缺陷的推论。这个推论必须依赖于一些假设,它们不但是不合理的,而且一个人只有在那一历史背景下才会提出它们。或者,这个推论会依赖于一种推理模式(mode of reasoning),它不让人信服,并且只能在那一历史背景下变得可以让人接受。此外,我们必须能够分辨出这些缺陷和错误。因为我们的确想说,那位作者是由于他犯了这些错误而坚持这个观点,并且由于这些错误(尽管它们可能是可被理解的),那位作者认为他坚持他的观点的理由是充分的。

然而,我们通常甚至都找不到这种解释。因为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地尝试,我们也不能够找到下面这样的一组哲学上的考量,亦即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历史情境下基于纯粹哲学的理由(philosophical grounds)而使用的这些考量。即便考虑到相关前辈的思想,我们也不能做出这些假设,或认为这些论证是可接受的。通过纯粹哲学的语言以及从狭义的哲学史角度来看,对于那些缺陷和错误(它们使那位哲学家把他的理由当作是支持他的观点的好的理由),存在一些引人注目的、值得关注的、令人讶异的或是令人震惊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在哲学史之外寻找一种历史解释,这一解释依照某些其他的历史背景、其他一些历史。这样,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说,理解为什么那位哲学家会使用那一特定的推论的唯一方式,在于做出以下假定:那位哲学家很难使用基于哲学的理由而本该更加可取的某种推论,这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religious convictions),那个时代的宗教信仰,并且因为那样的信仰鼓励这种思考方式而不鼓励相对立的观点。

首先,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在实际操作中,可能比较难确定,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为了试着给一位哲学家提供一种推论(这一推论至少从哲学史角度来说是可以被理解的),我们应该走多远。也比较难确定,在什么时候我们就应当放弃这一点,转而从其他一些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一个解释。很自然地,哲学史家试图把历史上的哲学家当成哲学家来严肃对待,并由此尽可能地通过纯粹哲学上的考量来解释他们的思想。

其次,我们可能会假设,哲学史家在处理历史上的哲学时的选择性,导致了很多需要从哲学史之外的一些历史的角度来给出一个历史解释的哲学思想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出于一些甚至对于他们的同时代人来说也没有多少哲学意义的理由而持有哲学观点的哲学家往往只有很小的【xvii】哲学影响力,并由此消失在哲学史当中。一般说来,似乎我们可以不涉及其他一些历史来解释在哲学史上占有关键地位的哲学家的思想。但是,无论我们如何狭义地考虑哲学史,仍然会有一些哲学史处理的思想必须要从其他一些历史的角度来理解。

所以,尽管哲学史家通常依据哲学上的考量来解释进入哲学史的那些历史上的哲学观点,但是基于上述理由,很明显仅仅理解“一位哲学家持有某一观点”这个事实是不够的,因为这不足以解释他犯的错误。并且,除非这些错误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偶尔都会犯这种错误,否则这些错误需要一个依据其他一些历史的解释。例如,我们可能会认为,一位哲学家使用了某个推论这一事实,只能通过他生活的历史中的某个让他想到这个推论的事物来理解,这诱使他以某种方式来思考一个特定的问题,使得他难以通过别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也可能得出结论认为,一位哲学家使用了某个推论这一事实只能通过他所处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历史来理解,这使得他难以通过别的方式来思考某些问题。我们会猜测,他倾向于那种哲学推论的理由和宗教史有关,并且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很难接受某些哲学推论,尽管基于纯粹哲学的理由,这些哲学推论甚至要更加可取。既不是最后、但也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有人也许会想到,对哲学的追寻也是一种社会建制(social institution);从社会建制的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解释学生持有和他们的老师相似的观点,也可以解释有时候很难持有不同于某人的老师或某人所在学派的观点。存在很多方式让很多哲学史之外的历史干涉到一位哲学家的思想,并使这一思想无法仅仅基于哲学的理由而得到理解,甚至也无法基于在哲学史的那个时间点能获得的哲学的理由而得到理解。

现在,尽管我认为我们应该以这种方式看待哲学史,我也承认,以这种方式看待它包含了一种很显著的抽象化和理想化(abstraction and idealization)。一般而言,我们会假设哲学家采纳某些观点,是因为他们有某些哲学的理由来这样做。但事实上,哲学观点似乎是以一种极其复杂的方式而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哲学的理由和哲学上的考量只是构成了这种方式的一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了,即使是在一位哲学家有一个好的理由采纳他的观点、并且在他无疑肯定是【xviii】出于这个理由而采纳它的情况下,我们也会认为,那位哲学家的观点依赖于一些早先的哲学家,他从他们那里学习到正确地来看待



问题;没有他们,他或许根本不可能出于正确的理由而主张正确的观点。而这一点反过来也和下面这个进一步的假设相容,亦即我们的这位哲学家,由于他的非哲学的(比如说道德上的)考量,在这些历史情境下(比如说,在这些社会环境下),很难不使用这个推论、不采取所讨论的这个观点。仅仅考察使得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提出他们的哲学观点的哲学上的考量,我们将无法理解希腊哲学的起源——除非我们对于希腊社会的历史有足够的理解,从而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个社会需要一些像是哲学的东西,并理解这一点如何影响了最初的哲学家们的思想。哲学家出于哲学的理由而持有他们的观点,和下面这个假设是完全相容的,亦即存在许多影响了他们的思想的其他历史。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当他们的思想偏离正常轨道(*get derailed*)、使得我们不能依据纯粹哲学上的考量来理解它的时候。但即使哲学家是出于纯粹哲学的理由而采纳了一个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出来的同样的影响也有效。

事实上,哲学家的思想是如何牢固地根植于他们所处社会的生活,甚至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这可能会让人产生深刻印象。我长时间以来都对这一点印象深刻:哲学家的思想如何在某种程度上是自传性的(*autobiographical*)。不需要很多思考,我们就能毫不惊讶地看到以下这点:哲学家们聚焦的话题,他们处理这些话题的一般进路,他们论证的方式,他们阐明自己的观点的方式,甚至常常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也都是他们的生活和个性的反应。同样不会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哲学家的思想应当密切反映了他们所处的生活、历史和社会的特点。一个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友爱在古代道德哲学中具有那么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亚里士多德用了《伦理学》的两卷来处理这个话题,除非那个人理解了友爱在古典希腊时期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所起的巨大作用。一个人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让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除非那个人认识到,个体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在古典希腊时期和在当下是非常不同的,并且与此相应,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关系也以相当不同的方式被考虑。基于纯粹哲学的理由很难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几乎整个古代晚期的哲学都是某种形式的柏拉图主义;显然,在柏拉图主义占据了支配地位和征服罗马帝国的新宗教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是,对这种想法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像下面这样认为的话,那就是错误的。这就是说,认为哲学家为他们的观点所提供的理由,或哲学史家归给他们的哲学上的考量,仅仅是这些哲学家实际上是出于别的理由而主张的观点的看似合理的解释(*rationalizations*)。【xix】这样认为的话,那就是低估了某些哲学家的理智能力、创造力、机敏和真诚;他们本已经准备好随时转变、修正,或在必要时候放弃他们的任何观点,以得出一套信念(他们本可以为这套信念提出令人满意的理由),即使他们可能一开始就试图证明他们基于其他理由而倾向持有的观点是合理的。并且,我们正是必须要通过这些理由,才能够试着理解他们的观点,除非我们想要认为在整个哲学事业(*enterprise of philosophy*)中存在着某种误导性的东西,它容许我们忽视哲学家是出于哲学的理由而持有哲学观点的要求。再者,我们必须意识到,即使我们相信经常给出的哲学的理由只是一些看似合理的解释,它们也依然是必须要

就其自身被考虑的理由；并且这些理由可能最终会变成非常好的理由，尽管它们可能也会出于别的理由而被采纳。此外，它们并不是通过作为看似合理的解释的方式来影响这一哲学史，而是作为理由，好的或差的理由，更可能的或不可能的理由。正是因为这一点，哲学史试图尽可能地基于纯粹哲学的理由来解释哲学家的观点。

但即使我们以这种方式来思考哲学史，基于已经给出的理由，我们也会想要坚持认为，哲学家的思想和各种历史相联系，其中一些历史可以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某位哲学家持有某个哲学观点，即使他持有这个观点是出于哲学的理由，甚至是好的哲学的理由。而且，这些历史常常有助于塑造哲学思想，也就是说，当这种哲学思想的确切形式和内容无法通过纯粹哲学上的考量而被确定的时候。再有，我们必须意识到，哲学思想本身也有助于塑造许多其他的历史。

因此，如果我们把古代哲学当作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或是作为一个整体、或是作为一个部分而进入了很多历史。正是因为这一点，它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被探究，所有这些方式都有助于对这个对象的更丰富的理解。仅仅就其自身来考察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将只会产生对于古代哲学的一种非常片面的（partial）理解。哲学史会走得更远。但同样，哲学史也不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于古代哲学的抽象的、大体的（general）理解。要尽可能多地理解古代哲学的具体复杂的细节，我们就必须也要考察所有其他历史，这些历史通过双向的因果联系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和古代哲学相连。

所以，如果我被问到，我对古代哲学的兴趣是否主要是对于哲学的兴趣，还是对于哲学史的兴趣，我会说，二者皆不是。因为我感兴趣的主要是古代哲学本身（如它出现在它所进入的各种各样的历史中那样），以及古代哲学实际进入这些各种各样的历史的方式。

【xx】正是因为我以这种方式看待我对于古代哲学的兴趣，所以我对古代哲学的整个历史都感兴趣。因为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如果有大量古代哲学思想不能通过我们自己也会采纳的理由来理解的话，如果即使能够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的思想也可以得到更彻底地理解的话（假设我们从古代哲学史的角度来理解），那么，一种对于古代哲学史的理解就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不能仅仅通过考察一种历史的少数几个部分来达到对于这一历史的全面理解，尤其是如果这些部分的选择不是着眼于从这一历史的角度来说什么是重要的，而是比如说从我们当下的哲学兴趣和趣味的角度来说什么是重要的。我们不能指望通过仅仅考察古代哲学的开端来理解古代哲学史，因为很明显，历史被如何构建，关键取决于它如何持续、如何终结。这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在说我们只能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理解一个哲学观点；这就是说，只有当我们看到这个哲学观点如何融入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一历史；亦即只有当我们不仅理解了是什么导致了它，也理解了它是如何导致了接下来的事情。如果我们试图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不但在柏拉图道德哲学的背景下审视它对我们而言是大有裨益的，而且考察它在漫步学派中流传的时候变成什么样子，考察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怀疑派如何回应它、转变它，也是

大有裨益的。

因此,我的作品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关于希腊化哲学的,尤其是斯多亚学派和怀疑派,因为差不多直到最近,<sup>①</sup>我们才对古代哲学的这个部分有了些许理解。对此的一个理由是,希腊化哲学家曾被看作是二三流的哲学家,只有很少或没有哲学趣味。而随着我们对他们有更好的了解,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三个事情:(1)希腊化哲学家在哲学上非常有意思,一旦我们做了历史学家烦琐的工作来恢复和重建他们的真实观点,而不是仅仅相信自从近代开端以来哲学家们告诉我们的关于希腊化哲学家的东西。(2)我们将会更好地理解从笛卡尔到康德的早期近代哲学,一旦我们充分意识到早期近代哲学是多么显著地受惠于希腊化哲学。(3)前希腊化时期的古代哲学开始以一种不同的、更好的视角呈现出来。因此,对希腊化哲学的关注在近十年来有了显著的增长,这一点并不让人惊奇。

然而,我极其希望我们很快也能对古代晚期哲学说同样的话。对此的一个反驳是,古代晚期哲学在哲学上无聊乏味,如果不是让人反感(repellent)的话。同样,这个判断不是基于对证据的细心研究,而是基于有关古代晚期哲学的老生常谈。对我来说,下面这三点很清楚:(1)普罗提诺在哲学上极其有意思。(2)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中世纪哲学的不同传统(拜占庭哲学、伊斯兰哲学【xxi】和西方拉丁世界),除非我们理解了古代晚期哲学。(3)并且古代晚期哲学极大地增进了对于希腊化哲学和古典时期哲学的历史的认识。我们可以从普罗提诺那里学习到更多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知识,相较于大多数对那位斯塔吉拉人的现代解释而言。因此,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迎来古代晚期哲学研究的复兴。

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当一个人全然理解了某个观点,他才有机会理解“某个人持有这个观点”这一事实,所以我选择研究一个主题(subject-matter)——亦即逻辑学——的古代历史。既然我们现在似乎对这个主题有了特别清晰的了解,那么我们会相对容易地拥有一个对过去持有的逻辑学观点的非常高水准的理解。的确,在过去100年中,逻辑学取得了极大进展,使得我们现在对古代逻辑学有了更好的解释。但是这一点也显示出,仅有对于这个主题的理解是不够的。为了解释过去曾经被持有的观点的理由,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哪些推论是可以利用的、哪些是不可以利用的。对古代逻辑学的现代解释几乎总是会犯时代误植(anachronism)的错误,常常还很严重。

此外,对我来说,这样做是一件好事:选取一个观点或一组观点的复合体,在历史中追随它们,看看它们如何被解释和重新解释(reinterpreted),它们在什么语境下成了什么样子。像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这样的论著给了我们一个独特的机会来这样做,因为它是在哲学史当中被持续不断地研究的两三份哲学文本之一。在每个时期都有对于《范畴篇》的评注,它对哲学史有重大影响,并且它的内容通过概要手册(compendia)散

<sup>①</sup> 译按:1987年,下文对于古代哲学研究进展的描述指的也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情况。

布在所有层次的学习中。因此,我的很多作品都集中于这部论著,尤其是它的形而上学和实体学说。

鉴于我对古代哲学融入整个古代生活的方式感兴趣,我不但试着从作为一个整体的古代哲学史的角度来获取对于古代哲学的一些理解,而且对其他一些历史感兴趣,古代哲学的一部分也在这些历史中占有重要位置。我尤其对哲学和其他学问分支之间的联系感兴趣,比如说语法学、医学和修辞学。

对我来说,语法学由于以下理由而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在上学时,我很难理解传统语法学,无论是希腊语、拉丁语还是德语。后来我从现代语言学家那里得知,传统语法学非常让人困惑。尽管这种困惑的部分原因在于,我可能没能恰当地理解它。传统语法学起初受到斯多亚哲学的很大影响,后来又受到漫步学派的很大影响。但当然,解释传统语法学特征的相当多的哲学上的假定【xxii】没能被接受、理解,甚或都没能被承认,当这门学科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并被仅仅知道斯多亚哲学这个名字的学者所探究的时候。因此,语法学理论的关键特征不再被那些应当教授、修订和扩展这门理论的人所理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哲学观念可以传播到多远、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伪装来传播,它们可以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如果它们不被识别出的话。

古代医学特别让人感兴趣,因为在这里我们有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中,在不同层面上存在着双向的紧密联系。不只存在着哲学理论和医学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由于哲学家和医生都对生理学(physiology)甚至是病理学(pathology)感兴趣。而且在有关人类知识、科学和技艺(arts)的本性的哲学观点和医生看待他们的技艺的方式之间,也存在着紧密联系。事实上,医生发展出较为精妙的关于他们的专门知识和(一般来说是)专家知识的哲学理论,这些理论转而影响了哲学家。此外,我们可能至少会认为,这些古代医生非常关心的哲学观点或许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医学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确如此,但是更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这些基于哲学上的考虑的原理(principles)——我们可能认为这些原理最终会导致实践中的巨大差异——被更多的原理所补充,从而使不同学派的追随者之间的医学实践差异被大大缩小了,如果没有被消除的话。

医学的例子在这个背景下也让人感兴趣,因为古代医生拥有他们自己的哲学思想传统。可以说,他们都强调他们自己的哲学;这一哲学丰富到足以有自己的历史,并和哲学家们的哲学史(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the philosophers)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但不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史的一部分,而是与之并行的。更复杂的是,一些古代医生,比如比提尼亚的阿斯克勒皮亚德斯(Asclepiades of Bithyma)、梅诺多图斯(Menodotus)、塞克斯都·恩皮里柯和盖伦(Galen),他们也都是高水准的哲学家,足以让自己在哲学史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可以说,我特别关注的是医学中的哲学史。因为,哲学史家自然对它没多大兴趣,而医学史家也自然不愿意讨论哲学问题。

因此,我试图以这些不同的方式来研究古代哲学,希望对其复杂的真实情况获得一

种尽可能复杂的理解。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是研究古代哲学的非常好的方式,能够增进我们对这门学科的理解。尽管有时候,哲学家们说得好像只有一种研究古代哲学,以及一般的历史上的哲学的方式。有时候,他们说得又好像实际上并不值得去研究古代哲学,以及一般的历史上的哲学;很明显,他们假定只有一种研究历史上的哲学的方式,但【xxiii】通过这种方式来研究得不到多少收获。我确信没有人真的这样以为,但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意见或许至少可以澄清我的观点。

首先,古代哲学主要在哲学系被哲学家来研究,这只是一个建制上的事实。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古代哲学的研究者的职业。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结果,因为要理解古代哲学思想,我们就首先要去哲学地理解它。但这也造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因为古典学家、古代史学家、罗马法学者、医学史家、科学史家、神学史家,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们可能会觉得他们也应当以哲学家倾向于处理它的方式来处理它,而实际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合理进路。因为哲学家自然想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研究古代哲学:去哲学地理解它,并通过这样一种理解取得哲学上的收获。毋庸置疑(或至少表面如此),这不是其他所有人研究古代哲学思想的最终目的。一部伟大的古代哲学史是由一位神学家——E.策勒(E.Zeller)撰写的,他写这部历史的主要兴趣在于神学和神学史。然而,哲学家是由于一个历史的偶然而被鼓励用他们这样的态度来研究历史上的哲学,这个偶然就是,古代哲学和一般的历史上的哲学出于某一理由而成为哲学家教授和研究的对象。历史上的哲学似乎在18世纪末开始被哲学家研究和教授,在整个19世纪期间,它补充或增强了对于哲学的系统研究。有人可能会认为,伟大哲学家可以被当成“做哲学意味着什么”的典范,他们以一种模范的方式提出某些问题,他们对这些问题做出经典的回答;通过研究这些,我们会受益匪浅——即便我们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是如此,因为他们的错误甚至也是典范式的。

当然,对于历史上的伟大哲学家的这种态度有一个很长的传统。把伟大哲学家当作哲学经典人物来研究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在公元前2世纪末和公元前1世纪,哲学史上的某些人物——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被选为经典哲学家(classical philosophers),就像我们挑选经典历史学家、经典演说家、经典戏剧作家一样,这些作者应该被当作典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一种作品类型(genre)。再过两个世纪,哲学研究被局限于对这些经典哲学家的研究。哲学通过对于这些历史上的作者的文本评注而教授。很多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学问进入了他们的研究:必须准备好这些作者的可靠作品版本,真作必须和伪作区分开,文本中无数的历史典故必须被澄清。为了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说了什么,我们经常要意识到,【xxiv】他们是在处理某些遗忘已久的哲学观点。总之,像波菲利(Porphry)和阿弗洛狄西亚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phrodisias)这样的人都有广博的历史学问,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对哲学史本身感兴趣。他们只是学到了怎么样才能确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且哲学地理解它。就他们的目的而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过去的历史人物这一点只是一个偶然。

很明显,这样一种通过研究经典文本来教授和研究哲学的方式在现代已经不被认可。它在古代就已经面临一种压力;在中世纪,例如像“问题评注”(questions commentary)这样的体裁得以发展,可以让人在表面上评注一个文本,而实际上则是在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一旦我们开始通过系统表述自己的观点来研究和教授哲学,或是通过一本当代教科书来教授,另一个问题产生了。早先哲学家的观点可能已经过时了,但是我们不会意识不到在笛卡尔、莱布尼茨、洛克、休谟和我们自己或我们使用的教科书的作者之间,存在一种值得关注的差别。认为鲍姆嘉通(Baumgarten)、赖马鲁斯(Reimarus)<sup>①</sup>、克鲁修斯(Crusius)<sup>②</sup>和克努岑(Knutzen)应该在这些早先的哲学家当中占据一席之地的看法有点奇怪,认为康德应该通过评注这些作者来教授哲学的想法也有些不合适。无论如何,我们很容易看到,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对哲学的系统研究应该辅之以对于历史上的伟大哲学家的研究:把他们作为哲学模范来研究,把他们作为哲学家来理解和重视。而这样一种研究被称为哲学史研究,因为这毕竟是一种对于历史上的哲学的研究,也因为这种研究可以涉及某些甚或相当多的历史学问,正如我们上文中在亚历山大和波菲利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因此,当今的哲学家应该以这种方式看待哲学史的研究,并决定,如果哲学史的研究不再让我们有哲学上的收获,就应该被抛弃,这是很自然的事。诚然,哲学史的研究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被引入的,如果哲学史的研究不再能为这个目的服务,它就失去了其理论基础。

但是很清楚,这里存在着一种模棱两可。作为一门如我所描述的学科(亦即作为一门系统的历史学科)的哲学史的研究,和自19世纪以来哲学家们从事的,以及直到今天他们继续从事的对历史上的哲学的研究相比,是一种相当不同的事业(enterprise),尽管两者都被叫作“哲学史”。哲学史家想要理解哲学史,并且他想从这一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过去的哲学观点。至少就其自身而言,他并不意在充分认识到历史上的哲学家如何成功地(或没能成功地)以我们思考的方式(或我们应该思考的方式)来思考。

这种对待历史上的思想的进路的转换,以及随之而来的模棱两可,可能由于某种在历史学家的历史观意义上的哲学史观【xxv】而被遮蔽了很长时间。如果我们把哲学史本质上看作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定义了哲学事业的问题被更加清晰地看待和理解,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变得越来越明晰,如果我们甚至假设存在着某种机制或力量保证了这种进步,因此哲学史必须据此理解,那么,这两种哲学史的进路似乎就很容易重合。因为现在,哲学经典不但被用于展现对哲学问题的某种理解,而且展示了这一历史理解的局限,以及通过后来的思想家取得的进步来克服这些局限的必要性。这似乎就是写于18世纪末最初的详细的哲学史的核心精神。但是,认为正确理解和解释亚里

① 译按:此处原文为 Reimar,作者指的应该是 Hermann Samuel Reimarus。

② 译按:此处原文为 Cruse(下文中则作 Kruse),似乎有误,作者指的可能是 Christian August Crusius。

士多德思想的方式,就是将其看作是朝向康德主义(Kantianism)或其他某些哲学观点的一个关键进展的想法毫无疑问是错误的。19世纪充斥着这样的观点,它们解释了为什么哲学和它所属的文化一起走上了一条稳定的进步道路,其中的每一步都可以通过它们所导向的立场来给出一种几乎是目的论式的理解。但是,如果哲学史既是一部失败史(在其中,成功是可能的),也是一部成就史(在其中,失败是可能的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 we 有什么理由认为,有某种东西保证了哲学的进步,以至于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哲学史呢?

因此,在我看来,没有理由认为,把历史上的伟大哲学家当作哲学思想的典范来研究,和历史学家意义上的哲学史研究会以某种方式变成一回事。所以我也认为,“把历史上的伟大哲学家当作哲学的典范来研究是不是会让人在哲学上受益”这个问题,和“哲学史研究是不是会让人在哲学上受益”这个问题是不同的。我发现很难相信对这两者的回答不会是肯定的。即使是在没有任何历史知识的情况下,我们也不难看到,康德比那个有名的克鲁修斯更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更不说相比于我们同时代人了;我们也不难看到,从康德思想的复杂性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也很难看出,当我们在做哲学史的过程中,试图为持有某个最不同的——如果不是最反常的——哲学观点寻找一个尽可能好的哲学的理由的时候,我们不会在哲学上受益。除了为几乎任何可以想象到的哲学立场寻找一个哲学推论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拓展一个人哲学推论的全套本领(repertoire)呢?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学习以根本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并充分领会到一个人可以采取的不同立场的优缺点呢?

在这一切中,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当代哲学家的哲学观点和历史上的哲学观点一样,【xxvi】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是哲学史的一部分。那么,如果我们碰巧不只是对某个当代哲学观点感兴趣,而且也对“为什么某位哲学家会主张这个观点”这个问题感兴趣,那我们就要试着去找到我们在做哲学史的时候(或更一般地说,在研究历史上的哲学思想的时候)所寻找的那类答案。我们可能会期望,得到的答案是贯穿哲学史的那种答案,这一答案将表明,这个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早先的观点;至少也很可能的情况是,没有一个好的理由持有这个观点,但存在一些考量可以让人理解为什么那位哲学家确实认为他有一个好的理由持有这一信念。但是,几乎从不会发生的一件事是,我们认为我们归给那位作者的哲学上的考量是过时的,是那种我们自己不再使用的考量,因此这些考量必须要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解释。这必定构成了为什么一些哲学家似乎认为当代哲学不依赖于它的历史的部分理由。的确,因为我们可以不涉及哲学史的情况下(至少在大体上)理解当代哲学思想。而这是由于当代哲学家所使用的那种哲学上的考量,就是那种我们可以据此来理解任何哲学观点(不论是当下的还是过去的)的考量,而这样的理解不需要借助哲学史。但是,从“我们可以在不借助哲学史的情况下解释某人持有一个哲学观点”这个事实,当然无法推论出“这个哲学观点不依赖于哲学史”这一点。事实上,这个观点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哲学史,以至于在未来人们

将无法理解它,除非是从哲学史的角度。这只是因为我们几乎不知道哪些当代的考量在未来会显得过时,上面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显得模糊不清。

现在,如果我们不认为哲学史在本质上是一部对一系列永恒问题越来越理性的和在哲学上越来越令人满意的回答的历史,而是一部成就与失败的历史,在其中失败常常要比成就更有影响力,如果我们相信,哲学思想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哲学史,那么,从如上所述的哲学史当中可能会学到一些哲学上的东西。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对实际的哲学史有足够扎实的把握,那么我们就应该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我们自己的哲学思想是如何依赖于历史上的哲学的失败。只要哲学史还是主要被看作是一系列不够深远的成就——因此自然会带来更多让问题有所进展的成就,那么意识到一个人的思想受惠于他的前辈,也不能让人学到多少哲学上的东西。但是,正是因为哲学史家试图把历史上的哲学家当作哲学家来严肃对待,哲学史家可能会【xxvii】得出结论认为,哲学史在关键时刻走入了歧途。

如果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也很难看出来。因为我们必须根据我们认为好的理由,或至少是根据我们所认为的某人可能会借此把某个东西当成是好的理由的考虑,来做出这样的判断。鉴于这些都是受哲学史制约的事物,它们很可能会受到我们想要从它们的角度出发来诊断的那些失败的制约。很明显,这将会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因为如果我们对“什么是理性的”和“什么是合理的”观念和假设受到哲学史的制约,它们将使这一历史看起来是理性的和合理的,是一部成就史而不是失败史。

幸运的是,哲学史家除了当代哲学观点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依赖。理想情况下,他的作品会教给他某人可以持有的新观点,以及支持或反对旧观点的新理由;他可能会发现,存在好的理由支持一开始看起来不合理的观点。所有这些工作可能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他对于“什么构成了好的理由”的观念和假设,或对于“什么至少是合理的”观念和假设。因此,哲学史家很可能也会把哲学史上的一个发展诊断成一种反常现象,而从当代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发展似乎是完全合理的。当然,困难在于,哲学史家应当能够说服哲学家,这是基于纯粹哲学的理由而如此。

但是,如果我们不只是作为一位哲学史家来研究历史上的哲学,而是从它的所有角度来研究,我们就有更多资源可以依赖。或许在哲学史上的某些关键时刻,哲学史家认为他必须诊断一个失败,这个失败可能是思想的结果,而思想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要从其他某种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一个人甚至可以展示出,这一其他历史在这个时刻干涉了哲学思想的“自然”发展,无论这个发展现在对我们来说在哲学上显得多么合理。

一旦有人问了例如“什么是哲学”这样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就是,去考察历史上的思想,去研究古代哲学——(比如说)以我提出的方式:不只是把古代哲学家当作典范来研究,也不只是试图让他们融入哲学史,而是考察他们所处的所有历史,把他们作为例子,尽可能具体地看到,当一个人做哲学时,它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相当于



什么。在这一点上,一个人能学到的一件事就是,在古代成为一位哲学家和在今天成为一位哲学家是颇为不同的。毋庸置疑,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是一部差劲的哲学史,然而它可能也确实捕捉到了古代哲学的一个方面:学术的哲学史,鉴于它的目的而忽略了这方面,但这个方面是真实的、令人感兴趣的。

Arts. These idea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ou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proper order of reading them.

**Keywords:** Ma Yifu; Six Arts; Xiao Jing; Filial Piety

### **Establishing a Peaceful Society and Summarizing the Six Classics: Zheng Xuan's Intention Contained in his Explanation of the *Xiaojing***

LIU Zengguang

**Abstract:** Zheng Xuan's annotation of the *Xiaojing* coming into being wa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 since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refore, the view of making distinction between five Emperors and three Kings, the view of considering the *Chunqiu* as the greatest classic and *Xiaojing* as the fundamentalist classics,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some scholars before Zheng Xuan. Essentially speaking, Zheng Xuan proposed the idea that Confucius summarized the six classics through writing the *Xiaojing*, with the aim of rescuing disordered society and recovering the great way to peaceful society, this is rightly the core meaning implied in his explanation of the *Xiaojing*.

**Keywords:** *Xiaojing*; great peace; *Chunqiu*; Zheng Xuan; Six Classics

### **The Study of Ancient Philosophy**

Michael Frede

**Abstract:** In this paper, Michael Frede examines a variety of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philosophy. Frede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seeking "good reasons" in studying a position held by a certain philosopher; when we cannot find the good reason, we need to reconstruct a certain line of reasoning to achieve this; when we have difficulty in reconstructing this line of reasoning, we should appeal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 philosophical view. In this way, Frede draws attention to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ancient philosophy, arguing that this is crucial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philosophy. We should not only understand the thought of a philosopher philosophically, but also analyze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ought and its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order that we can show how this view was developed, and how it was expressed and defended in a particular philosophical way. Frede concludes that only if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philosophy satisfies this condition, can it be the ideal study of history of philosophy.

**Keywords:** ancient philosophy; research approaches; good reason; historical context